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梁景和 主编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自我与他我

——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

Ego and Other Ego
Female and Female Image in China, 1966 - 1976

黄 巍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梁景和 主编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自我与他我

——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

Ego and Other Ego

Female and Female Image in China, 1966 – 1976

黄 巍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 / 黄巍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ISBN 978-7-5097-8670-3

I. ①自… II. ①黄… III. ①女性-形象-研究-中国-1966~1976 IV. ①D66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7919 号

·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

自我与他我

——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 ~ 1976)

著 者 / 黄 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张树军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5.5 字 数：259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670-3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梁景和

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发生了重大变革，学术界迎来崭新的繁荣时期。中国近现代史与其他史学专业也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犹如本专业的其他领域，亦展现着自己特有的新生魅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史的复兴，80年代中期社会史的复兴，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文化史的兴起，这三条线索所铸成的链环与其他领域紧密结合，呈现出中国近现代史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中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走过二十多年的艰辛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的问题。^①1990年有学者撰文，^②提出“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1991年有学者在学术领域开始运用“社会文化史”^③的概念。1992年与2001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两次学术研讨会，^④会议集中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2005、2007、2009、2011和2013年分别在青岛、乌鲁木齐、贵阳、苏州和襄阳召开了5次中国

① 刘志琴（署名史薇）：《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②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参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③ 梁景和：《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关于社会文化史问题的讨论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梁景和于1994年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提要中说明本论文的“社会文化史”的属性，认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范畴的一个具体领域”，参见《〈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提要》，1994年5月未刊稿。

④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发表，^① 也有关于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文章。^② 2009年6月和10月，2010年4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3次“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③ 这也是开始以社会文化命名的学术会议。

2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征。

首先，社会文化史的本土化特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即关注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等问题的研究。社会史研究偏重于社会层面，即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研究。而社会文化史研究则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社会文化史就应运而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萌发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主要研究者是顺着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而走向社会文化史领域的。

其次，理论探索的自觉。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重视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在1992年“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2002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学者展开了讨论，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理论见解。^④ 此外，刘志琴的《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⑤ 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⑥ 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

① 参见吕文浩《“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朱浒《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毕苑《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黄鸿山、朱从兵《“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第四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② 梁景和主编《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③ 参见王红旗主编《中国女性文化》第1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二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④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⑤ 参见《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⑥ 参见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个重要概念》,^① 李长莉的《社会文化史: 历史研究的新角度》^② 等都属于社会文化史探索的理论文章。

最后, 展现出重要的研究成果。20 年来, 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③ 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 诸如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0), 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从传统到现代》(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王笛的《街头文化: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严昌洪的《20 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 2007), 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 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余华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9) 等, 均为重要的学术著作。^④

社会文化史发展至今,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 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 相关历史资料数量庞大, 但非常分散、芜杂、缺乏整理。相当多的研究者尚缺乏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自觉性和经验积累, 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建树。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 研究者缺

① 参见《河北学刊》2009 年第 3 期。

② 参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 成都出版社, 1992。

③ 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请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左玉河、李文平《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评述》,《教学与研究》2005 年第 3 期; 苏全有等《近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安阳大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 黄延敏《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近代中国与文物》2009 年第 2 期等文的介绍。

④ 重要的社会文化史学术著作还很多, 诸如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 1991) 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方平的《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德) 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 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王燕生等译, 中华书局, 2001); 薛君度、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等, 此不赘述。

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知识训练等。^① 这些都是具体的实际问题，需要学者一点一滴地处理和一步一步地解决。

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 20 年的历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盼望早日迎来社会文化史发展的新时期。2010 年 5 月出版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② 同期召开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③ 以及《光明日报》2010 年 8 月 17 日刊发的《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一文，既是对以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对社会文化史未来发展的一个期待。2010 年 9 月 25 日、2012 年 9 月 22 日和 2014 年 9 月 20 日在北京分别召开了“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 年 9 月 24 日在北京召开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2013 年 9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希望通过这样的会议来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我们坚信，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将会迎来崭新的发展。

社会文化史兴起之初就引起了诸多年轻学者的兴趣，如今则吸引着众多青年学者把社会文化史作为自己的学术向往和追求。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准备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热心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研究论著发表出来。现在本论丛已经陆续出版，希望能促进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2014 年 12 月 20 日修改于幽乔书屋

①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②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③ 毕苑：《“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回顾与走向”座谈会综述》，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二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	16
第一节 新中国十七年的女性形象定位	17
第二节 “文革”前后的政治文化语境及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	29
小 结	35
第二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类型与特征	36
第一节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类型	37
第二节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特征	84
小 结	90
第三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形成的原因	92
第一节 中共对妇女解放运动认识的简单回顾	93
第二节 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与“突出政治”的教育	109
第三节 全国妇联和地方各级妇联对女性的组织和动员	120
第四节 “批林批孔”运动对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强化	127
第五节 舆论宣传对政治化女性形象的倡导	132
小 结	151
第四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社会文化内涵	153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抗争文化	154

第二节 新社会与旧观念	165
第三节 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	178
第四节 女性意识与男权社会	186
小 结	195
第五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角色认同和女性的 多维面相	197
第一节 女性形象政治化的角色认同	197
第二节 女性的多维面相	204
小 结	213
结 语	214
参考文献	221
后 记	234

绪 论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 研究目的

中国妇女史和女性学的研究可以说是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本土互动的一个有效案例，特别是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妇女性别史学科的积极发展。然而，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却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同，前者主要是基于女性自发组织的理论挑战和实践活动，后者则是顺应了国家的革命运动和行政干预，属于自上而下的被动改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解放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给中国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平台，政府从法律上赋予了女性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并制定了如废除买卖妇女、严惩包办婚姻、取缔和关闭妓院、组织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等一系列措施，使她们逐渐完成了从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的转换，并出现了大量的女先进生产者、女劳动模范、女“三八”红旗手等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女性形象。

“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正是在新中国成立17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由于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动乱、经济上的破坏、文化上的批判以及“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引起人们的迷茫与困惑，这必然带给女性一种紧迫感。在当时主流文化的宣传和社会氛围的影响下，社会认可的规范也成了对女性个人的自我强制，几乎每个女性的角色定位都是在社会成员，甚至是家人的监督之下完成的。这种官方认同的规范也正是在人们相互交往中不断强化，所以这个时期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了巨大转化，出现了这一时代特有的女性形象，如“三忠于、四无限”的忠诚女性形象，“敢说、敢做”的女红卫兵形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

姑娘”形象，永远“扎根”农村的女知青形象，“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形象等。

虽然生活在“文革”时期的女性并不是每个人的形象都发生了政治化转向，但不能否认的是，即便其地域、民族、年龄、职业、阶级成分等有诸多的不同，她们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化的影响。可能这种影响时间上有先后，程度上有深浅，但“文革”时期女性形象问题的最大特色就是在政治运动的挟制下，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政治化转向。她们在思想、言论、行为、服饰等方面无不被国家政权力重新塑造，无论是官方宣传的女性形象，还是生活中女性的实际表现，无不带有这一历史时期特有的政治化痕迹。需要说明的是，“文革”10年中，也许还产生了其他类型的女性形象，但本书限于所叙述内容，只选取这5种类型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从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来透视当时的政治，以试图揭示出“文革”期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

通过深入研究和细致分析，不难发现，“文革”时期的女性虽然表面上看似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但这并不能说明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被激活，也掩盖不了“男尊女卑”意识对社会现实的影响。而获得社会角色的女性并没有获取更为先进的主体意识和本体意识，在现实行为与思想深处，“文革”女性处于错位的尴尬中，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被遮蔽。即便这一时期，有些地区贯彻执行了男女同工同酬原则，女性取得了和男性一样的经济地位，但实际上，女性和男性的平等远远没有实现。而且“文革”时期的男女平等是以忽视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别为前提，以女性去做男性能办到的事为代价，与之相伴随的是女性“男性化”性别文化的出现和“不爱红装爱武装”审美趣味的形成。“文革”时期，女性形象的“男性化”特征正是男权社会中男性优越地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背后隐藏的仍然是对女性的歧视。实际上，即便在女性看似强势的“文革”年代，女性话语仍然被淹没在阶级话语和男权文化之下，广大女性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革”时期，由于政治的影响，女性形象本来应该具有的自主性、多元性特征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可能，而呈现出被动性、单一性的发展脉络。在此过程中，女性自身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政治文化塑造，很难有精力去认真地自我反思。那么，生活在“文革”时期的这些特有的女性如何认同自身形象；其他普通女性又如何看待这些女性形象；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男性又

是如何认同这些女性形象；当这些普通女性成为全国的典型后，其思想、行为、社会地位以及家庭地位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女性形象产生的历史动因是什么；特别是如何揭示其中的深刻社会文化内涵等诸多疑问——都是本书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意义

“文革”虽已过去三十多年，但由于其持续时间长、发生原因错综复杂、影响深远而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文革”史研究是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就目前“文革”史的研究现状看，主要集中于“文革”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对于普通民众的婚姻家庭、性别性伦、娱乐消费、文艺体育、衣食住行、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却鲜有涉足。另外，对“文革”女性的研究比较重视宏观考察，对于微观方面的考察比较薄弱，尤其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文革”时期女性形象问题更是付之阙如，故本书的选题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理论意义

“文革”时期的女性受到了国家舆论导向、各级行政组织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治化转向。女性由“文革”初期热烈的盲目追随到后期的迷茫与困惑，无不带有时代特有的烙印。究其缘由，女性形象政治化的产生是社会现实中政治、文化、性别等多重力量运作的结果，其中交织着意识形态、文化建构、两性伦理等复杂关系，也在历史的、具体的社会时代语境的变迁中重构女性形象自身。本书通过对“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研究，以便于深刻认识“文革”时代政治对女性的重要影响以及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现阶段如何处理好国家、社会和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现实意义

本书通过对“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问题的研究，从而获得女性社会地位的整体性认识。从“被政治化的女性”这个特殊的角度出发，依据历史文献，配合个体的口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探究“文革”中女性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为“文革”史、当前社会文化史以及女性问题的研究与发展提供借鉴。

二 “文革”时期女性问题的文献和研究状况

（一）基本书目

1. 文献、档案、报刊

毛泽东在各个时期均有针对妇女问题的相关指示，散见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主席论妇女》等经典文献中，他的指示引导了当时舆论的发展方向，故为本研究提供了宏观历史背景。

档案资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包括“文革”时期对女性问题的相关报道，以及各时期的妇联章程、决议和工作报告等。从目前看到的这些档案中，可以发现很多新例子，为研究提供佐证材料。

报刊资料主要来源于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主要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北京日报》《中国妇女》等，从这些报刊对妇女问题的报道中，可以分析当时的舆论导向对女性的影响。

2. 年谱、回忆录、日记

《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等年谱是研究“文革”史重要的历史资料，便于分析当时宏观的政治背景。回忆录如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季羨林的《牛棚杂记》，马识途的《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1966～1976）等；日记如顾准的《顾准日记》，方广胜的《红卫兵长征日记》，张新蚕的《红色少女日记：一个女红卫兵的心灵轨迹》等，这类史料比较宽泛，很多内容反映了经历过“文革”的一些人的真实感受，便于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一步理解“文革”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

3. 口述史料

口述史料有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刘中陆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叶维丽、马笑冬的《动态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等。为了弥补档案、文献等官方史料的不足，笔者还访谈了一些经历过“文革”的55～75岁的女性与男性，收集口述史料。通过收集“民间话语”和“女性话语”，注重当事人自身的体验，从

当事人的角度看待历史，力图再现真实的场景。

（二）研究状况

1. 国内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妇女/性别史研究在中国迅速发展，新材料的发现以及新研究视角的介入，使学术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其中，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属于复兴阶段，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妇女运动史、妇女解放史、妇女生活史等，研究主体、关注的内容都得到了很大范围的扩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掀起了高潮，女性学学者也逐渐用社会性别视角来研究女性问题，为妇女/性别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进入21世纪，由于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内容都有了大范围的扩展，使妇女/性别史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梳理三十多年的妇女/性别史研究成果，专门研究女性形象的专著并不多见，特别是目前国内史学界专门探讨“文革”时期女性形象问题的专著和论文更是付之阙如。

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一书对“文革”时期全国各地出现的“扎根”农村的女知青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随着河北省白启娴“扎根”农村的事迹被报道后，一批白启娴式的女知青典型在各地脱颖而出。经过研究，作者认为，女知青嫁给男农民这种婚姻形式之所以被“拔高”，反映“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丑化。通过对女知青婚姻的分析，他认为，有很多女知青的婚姻只是为了完成某种政治目的，而作为婚姻主旋律的爱情却被忽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学学者逐渐开始用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如李小江指出，生活在“文革”时期的女性由于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其思想、行为、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革’时期，话语世界的核心思想是阶级斗争，‘阶级’概念决定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群体’性质，不仅抹去了人的个性特征，而且淡化了性别特征。不管是服饰、行为举止，还是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形象宣传等，女性都被倡导践行‘僧侣主义’，即以无性，甚至男性为标准。男女平等思想也一度被异化为否认男女两性差别的男女绝对平等”。^① 耿化敏对“文革”时期妇联组织的演变、组织危机与成因进行

^① 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以及谁制造话语并赋予它内涵》，《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01页。

了历史考察,^① 为我们了解妇联组织在“文革”时期对妇女运动的组织和动员情况,以及分析“文革”时期女性问题的阶段分期提供了便利。金一虹的《“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一文,考察了《人民日报》从1955~1982年“三八”社论的内容,认为可以把这一社论视为官方对妇女及妇女运动自上而下的一个指示、一个重要的政治导向,并且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在动员妇女方面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即动员模式的高度政治化,并且这一特点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即所有的性别问题都被纳入到政治斗争范畴。^②

目前国内已经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文革”时期的女性问题,并指导学生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如高毅的《论“文革”时期女性的异化现象》,^③ 认为“文革”时期的女性外在形象和内在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章从历史渊源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文革”时期的女性异化现象进行了分析。还有论文认识到了“批林批孔”运动对女性的重要影响,如曲阜师范大学的董业勋以曲阜地区为研究对象。文中列举了小雪公社北兴大队党支部领导用本大队妇女和男同志一起战天斗地的事实,批判“妇女无用”“妇女当家,墙倒屋塌”等轻视妇女的思想。文中认为,通过这种形式的分析批判和实际行动,使人们认识到了妇女的重要作用,从而揭示出“文革”中“斗、批、改”形式对女性的深刻影响。^④

姚鹭鹭的硕士学位论文《〈人民日报〉中女性形象的变迁》,^⑤ 认为在“文革”时期的报道中,女性是这场思想革命的突破口,最终被塑造为依靠精神、人定胜天的“高大全”的“铁姑娘”“铁战士”,文中认为,由于将女性形象扭曲为男性化的“钢铁战士”,因此造成了人们对男女平等认识的严重偏差。张倩的硕士学位论文《我国报纸新闻报道中女性形象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研究》,^⑥ 运用历史梳理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人民日报》

① 参见耿化敏《“文革”时期妇联组织演变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耿化敏《“文革”时期妇联组织危机与成因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5期;耿化敏《简论“文革”时期的妇女外交》,《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②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③ 高毅:《论“文革”时期女性的异化现象》,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6。

④ 董业勋:《“文革”时期曲阜“批林批孔”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0。

⑤ 姚鹭鹭:《〈人民日报〉中女性形象的变迁》,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7。

⑥ 张倩:《我国报纸新闻报道中女性形象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7。

《中国妇女》作为分析研究的文本，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认为在那个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年代，积极踊跃参加“阶级斗争”“批林批孔”运动的女性纷纷见诸报端，由于新闻报道的“泛政治化”，女性的媒介形象被边缘化和扭曲，女性成为政治意识的附庸。可见，二者都借用报纸资料，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问题，并认为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导致了女性形象政治化的产生。诚然，新闻媒体报道是其中原因之一，但这并不能揭示女性形象政治化产生的深刻社会文化内涵，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目前国内史学界专门探讨“文革”时期女性形象问题的论文并不多见，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多分布在文学、美术、电影等研究领域，主要从社会性别和结构主义符号学两个视角探讨问题。如李巧宁的《被“进步”迷失的女性——从随笔中的革命女性形象谈起》，^①考察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的大批女性纷纷走出家庭，投入社会工作的现象。认为当时女性革命极端性的产生原因是各种媒体宣传不断催化的结果，女性普遍认为，只有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才是安全的、进步的，这也是生活在“文革”时代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的表现。过分忧虑使她们在行动上出现了极端政治化，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高度政治化的结果。王林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当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书写》，^②认为文学作品中女性英雄人物的塑造普遍存在着“引路人+新女性”模式，而在“文革”时期“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时代，文学受政治宏大叙事的影响，于是出现了“爱情=女性气质=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简单等同关系，并由此认为女性性别意识被掩盖。此外，在“文革”文学中，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女性形象问题的还有期刊论文^③和硕士学位论文，^④在此不一

① 李巧宁：《被“进步”迷失的女性——从随笔中的革命女性形象谈起》，《社会科学家》2003年第7期。

② 王林：《中国当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书写》，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7。

③ 参见任美衡《“文革”农村小说：女性命运观照及伦理探索》，《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洪强《“文革”文学中的女性叙事》，《佳木斯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尹元华《生活在别处“文革”地下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④ 参见张艳《“红色经典”改编中的女性形象》，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8；郭渊足《“文革文学”中女性形象模式之探微》，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6；肖晶《革命文学与女性形象的塑造》，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程祥《温暖黑夜的光——余华“文革”小说女性形象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6；李红《“文革”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妇女形象》，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7。

一赘述。

近几年来，美术学也逐渐开始关注“文革”时期女性形象。张静森认为，“文革”时期的“泛政治化”为艺术铐上了致命枷锁，让其走向单一、守旧、僵死的深渊。^① 贺万里、董娟娟认为，“文革”时期出现的女性“男性化”倾向，其实质是一种对男女平等的误读和矫枉过正。这种所谓的平等，是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为原则，牺牲女性传统形貌，追求男性传统特征所达到的男女共性来实现的，它非但没能使女性真正地解放，而且更加凸显了中国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是传统男权文化思想在这一时期的翻版，甚至比过去更糟的是，它使女性陷入了耻为女性而强作硬汉的尴尬境地。^② 硕士论文如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的薛扬^③和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的刘冰侠^④分别在自己专业领域探讨了“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问题。

也有学者从“样板戏”和电影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入手分析问题，如沈光明通过对“样板戏”中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分析，认为“文革”是一个否定独立意识、弥漫着集体意识的时期。这些“雄化”和“非家庭化”的女英雄，尽管她们似乎跟男人一样，撑起了“半边天”，但是她们并没有女性的独立意识和反抗男权中心的主体意识，她们的女性特征荡然无存，因而这些女英雄也显得不伦不类。^⑤ 宋光瑛的《银幕中心的他者：“革命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也基本持同一观点。^⑥ 此外，也有其他论文对“文革”时期“样板戏”、电影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考察。^⑦

可以说，从社会性别视角入手解读“文革”时期女性形象问题占目前论

① 张静森：《试析“文革”美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8年第1期。

② 贺万里、董娟娟：《性别关怀与境遇思考——“文革”以来工笔人物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③ 薛扬：《“文革”绘画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05。

④ 刘冰侠：《“文革”时期水墨人物画》，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7。

⑤ 沈光明：《男性主导话语的产物——样板戏对女性自我的否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⑥ 宋光瑛：《银幕中心的他者：“革命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

⑦ 参见彭松乔《“样板戏”叙事：“他者”观照下的女性革命神话》，《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1期；陈吉德《样板戏：女性意识的迷失与遮蔽》，《上海戏剧》2001年第9期；王朝阳《样板戏的女人心事》，《粤海风》2002年第2期；张佳《论中国电影中性形象的嬗变》，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